



北京大学文科通讯
PKU Newsletter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弘扬学术传统
传播学术成果
交流学术思想
推动学术创新

第 6 期

2015 年 1 月-2 月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

投稿邮箱：skbpub@pku.edu.cn

本期导读

【学术荣誉】

- ※北京大学 20 位文科教师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 ※国家发展研究院在《2014 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位列高校第一
- ※董强教授获颁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 ※蔡洪滨、姜国华、王汉生等多位教授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 ※黄晓婷博士被聘为中国 PISA2015 正式测试质量监控官

【科研成果】

- ※梁根林教授论文在德国顶级法学杂志上发表
- ※李玲教授参与的 NTA 研究成果在 Science 发表
- ※刘明兴教授论文被英国《金融时报》录用并连载
- ※袁诚副教授论文被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收
- ※尚会鹏教授著《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出版
- ※贾庆国教授主编《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出版
- ※贾积有教授参与美国教育技术大百科全书条目撰写
- ※冯科副教授著《金融脱媒之殇》出版

【科研项目】

- ※北京大学举行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 ※祖嘉合教授承担市教育工委委托研究课题
- ※养老保险课题组参观中国人寿健康养老体验中心

【交流合作】

-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掌门人”劳伦斯·芬克访问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援建的泰国诗琳通中文图书馆落成

【会议讲座】

- ※2014-2015 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参与筹办的“中国经济论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举行
- ※第十二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
- ※首届环亚太青年计量学者 (YEAP) 会议成功举办
- ※北京大学多名学者出席中国影响性诉讼评选十周年论坛
- ※第五届未名论坛——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举办
- ※北京大学召开“中东形势回顾与展望 (2015)”研讨会
-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京大学法政学院“中美日三边关系学术研讨会”召开

【专题报道】

- ※田余庆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对我的启迪

【学术荣誉】

北京大学 20 位文科教师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近日，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遴选，北京大学 20 位人文社科类专家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除刘伟教授外，北京大学新增 19 位人文社科类学科评议组成员，涵盖 19 个人文社科学科领域。北大此次共有 47 位专家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专家人数居全国各高校之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领导下的学术性工作组织，主要从事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咨询、研究、监督和审核工作，是按照一级学科的目录设立并开展工作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经全国各高校推荐，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遴选聘任，任期为四年。学科评议组成员一般应是在同学科领域中有较高的学术声誉、有指导研究生的丰富经验并且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已取得显著成绩的专家学者。（摘自北大新闻网）

国家发展研究院在《2014 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中位列高校第一

2015 年 1 月 15 日，《2014 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公布。列综合影响力前 10 名的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该报告的专业影响力排名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经济建设”一项中位列第四，比 2013 年上升 1 位；在“政治建设”一项中，位列第四名，保持不变；在“全面深化改革”一项中，位列第五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在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二，在高校系统内排名第一。（摘自北大新闻网）

董强教授获颁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2015 年 1 月 29 日晚，正在对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理瓦尔斯阁下在法国驻华使馆一号厅为著名翻译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奖评委会主席董强教授举行简洁、庄严的授勋仪式，授予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北大副校长李岩松代表学校出席了授勋仪式。瓦尔斯总理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董强教授多年来为增进法中两国了解，传播法中文化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由拿破仑于 1802 年设立，是法国政府的最高荣誉。据悉，董强教授是迄今为止中国法语界获此殊荣的唯一人士。2008 年，他获得法国政府“教育骑士”荣誉勋章；2009 年起，担任全国“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会主席；2013 年荣获法兰西学院大奖：“法语国家联盟金奖”；2014 年被评选为“中法建交 50 年 50 人”之一。（摘自外国语学院）

蔡洪滨、姜国华、王汉生等多位教授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 (Elsevier) 近日发布 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 (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 榜单。光华管理学院蔡洪滨、姜国华、王汉生三位教授分别入选“经济，经济计量学和金融”类、“商业，管理和会计”类、“数学”类榜单。同时，北京大学多位教授入选各个学科榜单。该榜单的研究数据采集自爱思唯尔旗下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 (Scopus 数据库)，基于对海量的、与科研活动有关的文献、作者

和科研机构数据的系统分析而成，旨在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Scopus 数据库收录来自全球超过 5,000 个出版商、21,000 种期刊的 5,500 余万条文献索引，覆盖各个学科，并提供各种工具用于追踪、分析和可视化学术研究。此次榜单中，来自中国的社会科学、数学、经济等 38 学科的 1651 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入选。（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黄晓婷博士被聘为中国 PISA2015 正式测试质量监控官

经 PISA2015 中国国家中心推荐并经 OECD/PISA 协作组织同意，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黄晓婷博士日前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PISA 协作组织选聘为中国 PISA2015 正式测试的质量监控官（PISA QUALITY MONITOR，简称 PQM）。PISA 是一项由 OECD 组织实施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价项目，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该项目 2000 年首次实施，每三年举行一轮，全球 73 个国家和地区将参加 PISA2015 测试，包括我国的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等 4 个省市。黄晓婷博士近年来深度参与了中国 PISA2015 国家中心的相关工作，包括 PISA2015 测试工具的翻译改编及审定等。据了解，黄博士此次担任的质量监控官的职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 PISA2015 正式测试的数据采集过程进行监控；二是对 PISA2015 国家中心相关材料的准备工作进行监督和评价。（采自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科研成果】

梁根林教授论文在德国顶级法学杂志上发表

近期，梁根林教授的长篇学术论文《中国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回顾与立场》（Die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Verbrechenslehre - Überblick und Stellungnahme）正式在《整体刑法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rafrechtswissenschaft）第 126 卷第 3 期上发表。《整体刑法学杂志》历史悠久，是 1881 年由德国刑事法学大师李斯特（Franz v. Liszt）创办的世界著名刑法学杂志，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界一直享有极其崇高的学术声誉。该文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犯罪论体系发展的来龙去脉，对于我国刑法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精准定位与深刻评论，对于中国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引作用。同时，该文也让外国刑法学界更为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刑法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历史及其特色，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刑法与外国刑法的沟通与交流。（采自法学院）

李玲教授参与的 NTA 研究成果在 Science 发表

国际顶尖学术杂志 Science 发表了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玲教授参与多年的国民转移账户（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 NTA）项目的研究成果——“低生育率确实是个问题吗？论人口老龄化、社会依赖与消费”。NTA 项目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人口地理研究中心和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研究中心牵头成立，NTA 弥补传统 SNA 国民账户（United Nations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见物不见人的弊端，将人纳入国民账户，通过研究人终身的生产和消费，以及通过公共转移、私人转移和资产积累所发生的代际转移，将年龄结构纳入到 SNA 中来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李玲教授带领的团体贡献了中国部分的研究，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和人口政策的鲜明特征，中国部分的研究结果有相对重要的贡献，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对中国人口政策调整有很好的启示作用。（采自北大新闻网）

刘明兴教授论文被英国《金融时报》录用并连载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兴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合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一文被英国《金融时报》收录，并以5篇连载的方式从2015年1月底起连续刊出。文章结合中国经济转轨的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对近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个主要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评估。文章认为，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很难是一个理想化过程，也不可能有关切道，需要在充分认识去杠杆所带来风险的基础上，实现渐进和平稳的转型，并寻求相对温和的经济与社会后果。文章希望从当前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来做出解释，并提出本轮要有效去杠杆和调结构所需满足的一系列政治条件。（采自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袁诚副教授论文被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收

经济学院袁诚副教授与张磊副教授（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的合作论文“Public Education Spending and Private Substitution in Urban China”被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接受并发表。文章使用全国9个省份160个县级市2002-2006年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计了公共教育支出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生均教育支出的增加会导致家教费用的显著少量的减少，而且家教费用的减少在不同家庭收入之间的分布是不同的，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减少的幅度最大，中等收入家庭减少的最少，这反映出课外辅导与公共教育之间替代而非互补的关系。同时，研究还发现，独生女儿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显著多于独生儿子家庭，而教育财政对家教费用的挤出主要发生在后者，其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采自经济学院）

尚会鹏教授著《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出版

2015年2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所著《中国人与印度人:文化传统的比较研究》一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部比较研究著作，分为“上篇观念文化传统”和“下篇社会文化传统”两大部分，上篇主要叙述了印度的宗教传统、佛教在中印两国的命运、印度教对理想人生的设计、两国的审美传统和思维方式差异及科学技术传统，下篇主要讲述中印两国的亲属集团、婚姻、性文化、道德、社会群体的凝聚与分离、政治文化传统和对外反应模式。（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贾庆国教授主编《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出版

2015年2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贾庆国教授主编《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随着中美两国领导层更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两国日益关注的问题。什么是新型的大国关系？它都包含哪些基本要素？它跟传统的大国关系有什么不同？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中美两国历史经历、文化传统、政治体制不同，在中国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建构新型的大国关系是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中美建构新型的大国关系两国需要做些什么？新型大国关系是否只适用于中美，还是也适用于所有大国间的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机遇与挑战》围绕这些问题，邀集国内外知名国际战略专家如

王缉思, 贾庆国, 郑永年, 巴里·布赞等进行笔谈和争论, 最后由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贾庆国教授负责编选和评论。(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贾积有教授参与美国教育技术大百科全书条目撰写

受美国著名教育技术专家 Mike Spector 教授等邀请, 教育学院贾积有教授参与美国 SAGE 出版社组织编写的《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教育技术大百科全书)》中条目《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智能教学系统)》的撰写。该条目用 1500 个英语单词的篇幅, 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智能教学系统的概念、架构、功能、技术、发展历史、现状和前景等。该大百科全书由全球二百多位专家联合编撰, 贾积有是其中的三位大陆作者之一。该书于 2015 年 2 月出版发行。ISBN: 9781452258225。(采自教育学院)

冯科副教授著《金融脱媒之殇》出版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冯科的学术专著《金融脱媒之殇》一书于 2015 年 2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 28 万字, 深入研究了金融脱媒问题。该书作者通过实证研究, 得出结论认为, 为了应对信贷指标控制, 中国商业银行普遍采取了主动将贷款分流的手段, 典型的后果就是催生了大量的“影子银行”, 这种后果可称之为“抑制脱媒”; 而且, 大企业推行“主动脱媒”, 中小企业则短资长用、借新还旧。该书出版后, 其学术观点得到了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平安银行等金融机构高层管理者的重视, 并已购买该书数百册。不仅如此, 该书的研究也得到了我国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界的重视。(采自经济学院)

【科研项目】

北京大学举行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2015 年 1 月 28 日上午, 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项目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上海新金融研究院 (SFI)、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三方正式确定开展战略合作, 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主任李强,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 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海明,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苏英琦, CF40 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等有关领导及嘉宾出席了签约仪式。(采自北大新闻网)

祖嘉合教授承担市教育工委委托研究课题

近日,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下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项研究课题立项书, 委托马克思主义学院祖嘉合教授承担“西方近现代价值观教育与青年学生成长的关系研究”课题。据悉, 市委教育工委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委托研究课题, 旨在发挥高校学科、专家优势, 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科学研究, 推出一批高水平、有影响的理论成果, 为高校、首都及全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必要支持。(采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养老保险课题组参观中国人寿健康养老体验中心

2015年1月9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我国商业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课题组师生代表一行十余人在课题负责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教授的带领下，赴北京大兴区中国人寿健康养老体验中心调研参观。课题组师生与阎陆军博士就养老保障、养老产品设计、养老保险与养老社区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阎陆军博士表示，“养老”是一个社会性问题，在谈及“养老”的同时，必须兼顾“医疗保障”，未来可以采取政府、市场、社会以及慈善并进的方式，使得所有的老年人、失独、失能人群，都“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郑伟教授对本次调研参观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在人口老龄化急剧深化的背景之下，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是大势所趋，在这个多层次体系之中，商业养老保险可以贡献重要且独特的力量。（采自经济学院）

【交流合作】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掌门人”劳伦斯·芬克访问北京大学

2015年1月6日，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司主席、行政总裁及联合创始人劳伦斯·芬克先生(Laurence D. Fink)到访光华，为听众带来题为“Global Markets Outlook（全球资本市场展望）”的精彩演讲。贝莱德公司控制的资金仅次于中、美、日三国的GDP，位列全球第四。劳伦斯·芬克先生领导贝莱德长达26年，对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均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了解。演讲中，他从石油价格说起，为现场听众展现了未来世界科技变迁的宏大图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教授、贝莱德公司众多高管出席本次活动。（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援建的泰国诗琳通中文图书馆落成

2015年1月7日上午，由北京大学援建的泰国朱大孔子学院诗琳通中文图书馆揭牌成立仪式隆重举行。泰国诗琳通公主驾临朱拉隆功大学，亲自赐名并用毛笔题写“诗琳通中文图书馆”。在揭牌仪式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朱强馆长亲手将北大图书馆制作的琉璃文镇呈送给诗琳通公主。受朱大孔院中方院长韩圣龙博士的邀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李广建主任、赖茂生教授，图书馆别立谦副馆长以及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也一同前往参加了诗琳通中文图书馆的揭牌仪式，并参加了首届泰中图书馆学研讨会。朱大孔子学院诗琳通中文图书馆以建成泰国最具规模的中文图书馆为目标，将成为泰国民众认识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这标志着中泰文化推广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采自图书馆）

【会议讲座】

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会创立十五周年座谈会召开

2015年1月1日，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会创立十五周年暨北大经院博士生学术刊物《青年经济人》创刊座谈会在经济学院305会议室召开。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青年经济学会首任会长王曙光教授出席并发表讲话。学会第二任会长颜敏博士、第三任会长张悦博士以及二十余名已经毕业的老会员和学会现任骨干参加座谈。座谈会由青年经济学会现任会长杜浩然博士主持。北京大学青年经济学会成立于1999年，最早由王曙光会长带领同时期一

批共同拥有学术梦想的青年博士生发起创立。学会历经初创期、发展期、复会期、壮大期等阶段,经过十五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领域博士生交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采自经济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第二期“藏书讲谈”成功举行

2015年1月5日,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图书馆考古文博学院分馆承办的“藏书讲谈”活动第二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本期主题为“心游万仞大象其生——漫谈《汉画总录》”。讲谈活动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化成老师主持,受邀嘉宾有陕西省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康兰英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梅田老师,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朱青生老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老师、杭侃老师、晁华山老师、沈睿文老师等。老师们围绕《汉画总录》一书的编辑历程、汉画中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以及如何阅读和使用类似书籍等问题展开了精彩的讲谈。(采自北大新闻网)

“新常态下的民生财政政策”圆桌座谈会举办

2015年1月6日,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举办了“新常态下的民生财政政策”圆桌座谈会,探讨新常态下宏观政策与改革方案对民生财政投入的总量、结构与体制安排所产生的影响,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10余家单位的20余名国内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就新常态下的民生财政政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来自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教育学等不同的专业领域。财政所所长王蓉教授认为,多学科的交流与对话对于民生财政政策尤其是教育财政政策的研究和决策十分重要,希望以后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者之间能够增加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采自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参与筹办的“中国经济论坛”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举行

2015年1月7日,“2015年中国经济论坛”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举行,应邀出席论坛的多位中国著名经济学者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改革与经济发展前景做出较为乐观的解读和预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就“三中全会后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就“中国经济改革对中长期经济发展影响”,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教授就“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就“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对外投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策略师黄海洲博士就“中国资本市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就“利率自由化”等话题发表看法与演讲,并与出席该论坛的300多名当地经济学界、商界和新闻界人士进行了互动和交流。(采自国家发展研究院)

国子监大讲堂第119讲:元曲赏析——马致远散曲鉴赏

2015年1月10日,由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与北京市东城区教委联合承办的“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第119讲在东城区国子监中学开讲。本期讲座继续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简教授讲授“元曲赏析——马致远散曲鉴赏”。李简从散曲的概况讲起,她指出,散曲是继诗、

词之后兴起的又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是“流行歌曲”的歌词，大约萌芽于宋金之际，金末元初时已很盛行。元代散曲在文本的表现形式上，在衬字、用韵、对仗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在作品的表达上则以显露透辟著称，风格豪辣。在内容上，男女风情、叹世归隐、咏史是其间最重要的题材。李简教授渊博的知识、精彩的教授博得了学员们的热烈好评，同时也为北京大学国子监大讲堂本学期的讲座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采自北大新闻网）

第十二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

2015年1月10日，第十二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办。本届文化产业新年论坛以“文化战略与产业融合”为主题，并结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就文化产业领域前沿问题进行探讨。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叶朗教授首先为论坛致辞，回顾了往届的论坛内容，肯定了实践应用和产学研跨界融合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对论坛的学术性和理论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陈少峰、向勇、彭锋、花建、周庆山等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做主题演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教授在最后以“当代中国的文化想象：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的思考”为题，畅谈了构建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采自艺术学院）

2015年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圆满举行

2015年1月12日上午，2015年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在五四体育中心205室举行。本次论文报告会全面展示了体育教研部在过去一年中的科研成果，也对新一年科研工作的发展作了展望与规划。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耿琴、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副司长刘爱杰、体育教研部主任李宁及体育教研部全体师生参与了会议。会议由体育教研部党支部书记张锐教授主持。（采自北大新闻网）

数量金融国际会议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

2015年1月13日，数量金融国际会议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成功举行。本次会议旨在为数量金融领域，包括数学、统计、金融、经济、计量和保险等方面的学者和专业人士提供一个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的平台。近200名国内外数量金融领域的学界专家、业界人士、青年学子齐聚光华，就最前沿的理论以及实证成果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中国科学院院士严加安教授全程参加了此次会议。韩国首尔大学的Seungmoon Choi教授、香港中文大学Yue-Kuen Kwok教授、复旦大学马成虎教授、南开大学王永进教授、中国科学院夏建明教授、微量网董事长兼量邦金融科技集团董事长冯永昌博士等都做了精彩的报告。（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大学举办年会

2015年1月14日，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期刊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期刊专委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办了两年一度的年会。北京高教学会图书馆工作研究会的理事长、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姜爱蓉老师出席了年会并致辞与讲话，期刊专委会成员馆代表近3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期刊专委会秘书长、北京大学图书馆文献计量学研究室何峻主任主持。期刊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别立谦副馆长向大会作了2013-2014年期刊专委会工作汇报及2015年工作计划。与会代表交流了各馆期刊工作的情况，并就期刊的订购、外

借、装订等具体业务开展了讨论。未来传统期刊工作将何去何从仍是各馆关心的共同话题，期刊专委会将尽力引导期刊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摸索与转型。（采自图书馆）

“批评家文艺沙龙”第九讲举办——贾樟柯电影“空间”研究

2015年1月15日，由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举办的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第九讲活动于艺术学院434会议室举行。来自巴西圣保罗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丽娅·梅洛（Cecila Mello）博士作了从电影媒介空间性角度解读贾樟柯电影的学术报告。丽娅梅洛女士专门从事中国、英国的现实主义电影研究，主要聚焦影片中的都市空间文化，以及媒介交融与间性等问题。这次主讲她将目光放在贾樟柯电影中的建筑与记忆，探寻电影是如何将记忆放置在空间中，通过空间化来展现时间记忆等问题。艺术学院副院长陈旭光教授、影视系主任李道新教授就丽娅·梅洛博士发言报告的独特视角进行了点评讨论，参加沙龙的30余位艺术学院在读研究生、博士生及博士后围绕报告主题展开思辨，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学术交锋。（采自艺术学院）

首届环亚太青年计量学者（YEAP）会议成功举办

2015年1月15-16日，由北京大学统计科学中心和北京大学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承办的“首届环亚太青年计量学者（YEAP）”会议在光华成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有20篇入选论文在会议上进行了报告和交流。光华管理学院商务统计与经济计量系联合系主任陈松蹊致开幕致辞。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Yacine Aït-Sahalia教授和美国堪萨斯大学蔡宗武教授应邀分别就高频数据的主成分分析和外商直接投资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引发了在场青年计量学者的热烈讨论。此次会议对推动国内青年计量学者间的学术交流以及国内计量学科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并将成为一个国内以及亚太地区青年计量学者增强彼此交流，加强合作研究的最新平台。（采自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召开2014年度学术交流大会

2015年1月15日至16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年度学术交流大会在学院112报告厅举行。学术交流大会作为教育学院一年一度的重要学术交流活动，已成为全院教师交流学术观点、成果和未来学术规划的重要平台。学术交流大会的召开不但增进了各系教师之间知识信息的学习共享，而且为他们进一步实现学术合作与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教育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本届学术交流大会。（采自北大新闻网）

2014-2015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工作会议召开

2015年1月16日，全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发展工作会议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开幕。本次会议为期一天，分为大会和分组讨论两个部分。在大会的第一部分，院系及研究机构代表分享发展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探讨未来发展方向等；第二部分由财务部、人事部、研究生院、社科部等职能部门作专项工作汇报。本次会议总结了2014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领域各项工作，并围绕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的学科建设、跨学科研究、国际化、大数据应用、智库问题、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了探讨。会议还表彰了在2013年和2014

年科研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192 位教师与研究机构负责人。（采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多名学者出席中国影响性诉讼评选十周年论坛

2015 年 1 月 18 日，由中国案例法学学会、《南方周末》报社、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律评论》共同主办的“中国‘影响性诉讼’评选十周年论坛暨《中国法律评论》创刊一周年纪念会”隆重举行。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北大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罗豪才教授，北大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兼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姜明安教授，法学院人道法与人权法研究中心主任龚刃韧教授及法学院沈岿教授等来自法学界、实务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和律师等近 200 人出席了盛会。本次论坛还分别颁发了主办单位共同评出的“中国法治影响力终身成就奖”、“首届中国法治影响力人物”等奖项。北大法学院校友邹碧华等十人荣获首届“中国法治影响力人物”。（采自法学院）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召开

2015 年 1 月 21 日上午，《谁掌控美国的战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史（1942—1991 年）》、《美军眼里的中国军队——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研究报告》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C105 室举行。会议主题为“美军战略规划与对华军事评估”，由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世界知识出版社联合主办。会议首先由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梁守德教授、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罗养毅致辞。中心副主任于铁军介绍了“北京大学战争与战略研究丛书”概况，中心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晨博士和国防大学教员郭拓荒上校代表两部新书的译校者介绍了书籍的翻译和编校情况。（采自国际关系学院）

北大学者日本札幌大学阐述国家话语发展新趋势

2015 年 1 月 25 日，日本札幌大学孔子学院举办“2015 年新春汉语教师教学研讨会”。北京大学教授、全球修辞学会会长陈汝东等应邀做主题演讲，来自北海道各高校的 20 余名汉语教师参会。陈教授以“中文教育与修辞学以及国家话语研究”为题，阐述了国际汉语教育和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性。他认为，由集体叙事转向集权叙事、政府叙事与民间叙事结合、现实叙事与虚拟叙事融合，由国内叙事转向全球叙事、由柔性叙事转向刚柔相济、内外融通、古今结合的多重叙事等，是近年来中国国家话语发展的新趋势。胡成花做了题为“中国的老年人口政策制定及管理”的演讲，她介绍了中国当前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对策，特别是老年人口政策的公平性问题。与会教师对演讲进行了热烈讨论。（采自新闻与传播学院）

第五届未名论坛——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举办

2015 年 1 月 26—31 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举办的“北京大学第五届未名论坛暨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相关学科博士研究生高级研讨班”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论坛以“中国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邀请了顾海良等多位专家、学者前来讲学或参加座谈。本次论坛不仅安排了近十场专题讲座，同时也设置了中西马高端学术对话和嘉宾学术座谈节目。论坛依托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氛围，从而使学术对话成为未名论坛最为

精彩的一笔。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对研究问题展开论述，也启示青年学子在研究中要跳出单一思维模式的限制，学会从多个视角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摘自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大-阳光公益年度论坛”举办

2015年1月28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在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办北大-阳光公益年度论坛暨“2014年中国社会发展十大事件”发布会，来自学界、业界和媒体行业的70余位专家参会，并围绕评选出的最具社会进步意义的十大年度标志性事件，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实践经验，就理念进步、制度创新、网络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三个议题，分别从不同视角对2014年中国社会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这是该中心连续第六年基于对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深度关切和理性判断，以“记录历史，关注影响，探寻社会进步特点”为目标，进行中国社会发展十大事件评选、研讨与发布。（摘自北大新闻网）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京大学法政学院

“中美日三边关系学术研讨会”召开

2015年2月4日至6日，贾庆国院长率领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陈绍锋副教授、雷少华博士、节大磊博士和五名博硕士生赴日本东京大学参加由我院和东京大学法政学院联合举办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学术研讨会。日方代表团包括东京大学法政学院藤原归一教授、高原明生教授和松田康博教授等人。双方学者围绕规范、利益和权力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的角色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国际关系学院学生和东大法政学院的博硕士生围绕着中日关系的演变、中日之间的危机管控、钓鱼岛争端、东亚的权力转移、中国的对外援助等话题进行了个人报告和讨论。（摘自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大学召开“中东形势回顾与展望（2015）”研讨会

2015年2月9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东形势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第二会议室举行。原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现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宫小生，前中东问题特使王世杰、吴思科，前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乙，前驻埃及、黎巴嫩大使安惠侯，前驻阿联酋、约旦大使刘宝莱等资深外交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国富就2014年中东局势变化及2015年走向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对伊核问题、“伊斯兰国”、海湾局势、巴以和平进程等地区热点问题做出了深入解读和预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付志明教授主持了此次研讨会。（摘自外国语学院）

【专题报道】

田余庆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对我的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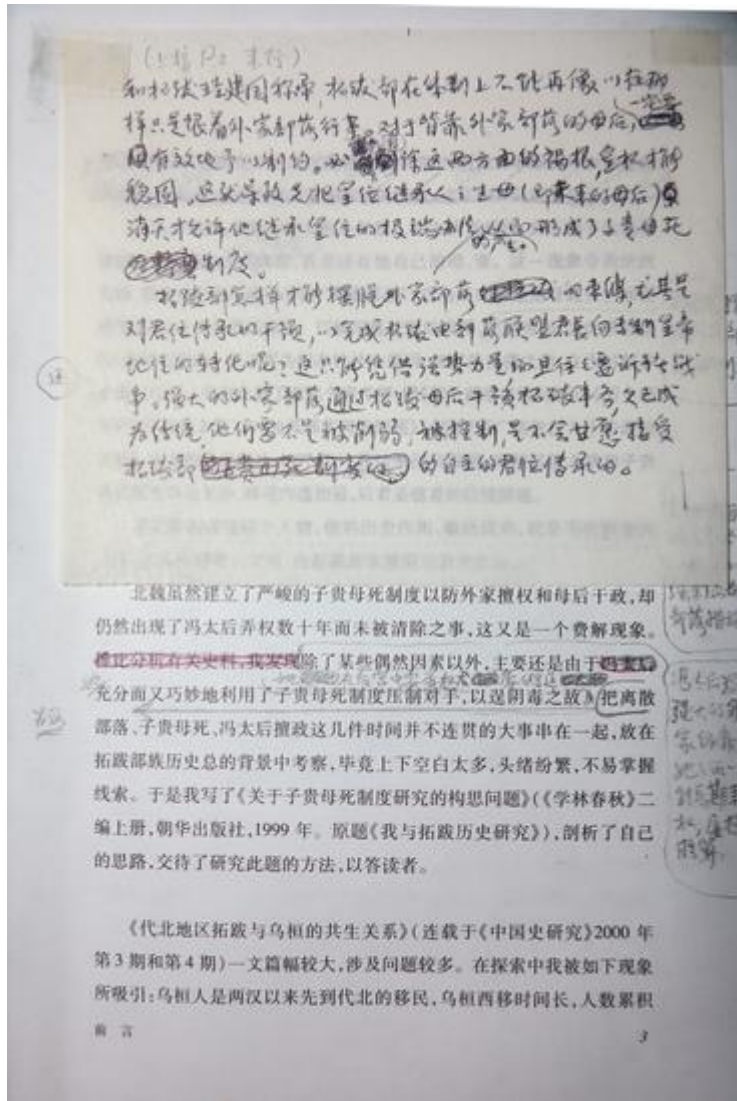
阎步克

（摘自《上海书评》2015-01-11）

“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这是田余庆先生的典型风格。



2010年，田余庆先生在北大燕园。



田余庆先生著《拓跋史探》修订本原稿

“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这是田余庆先生的典型风格。故他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

2015 年到来之前，田余庆先生溘然长逝。亲友为之悲痛，同仁、学生和读者表达了深切哀思。一直到临终的前夜，年届九十的田先生仍保持着温厚含蓄的风度、清晰的思维和体察情感的能力。生理的老迈，未曾磨损其生命的品质与尊严。其史学成就和富有特色的治学风格，赢得了赞佩敬仰。当然学者术业各有专攻，对田先生的评价肯定见仁见智、取其所需；而读者口味各异，也将乐山乐水、各有所好。作为田先生的学生，此时只是就一己之所得，向一般读者择要略述先生的成就，以及对我个人研究教学的启迪。写作时仍带哀思，笔下难免感情色彩，希望没有溢美之辞，因为那不合于田先生一贯的淡泊品格。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初版）一书，被视为田余庆先生的代表作。此书以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为研究对象。秦汉政治舞台上的主角，主要是功臣、外戚、宦官、儒生、文吏等。而至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史出现了一个重大变迁，一个被称为“士族门阀”的阶层崛起了。对这个阶层的政治权势、经济基础、文化特征，对其在汉唐间的兴衰，

以往中国学者如陈寅恪、周一良、唐长孺等，以及日本、西方的相关学者，提供了各种论述。田先生的这部新著，又获得了较大推进。

《东晋门阀政治》的不少章节，都曾以单篇论文先行发表。在它们汇为一书后，其对中古门阀政治的观照，就更富整体感了。东晋江左几个侨姓大士族的沉浮兴衰，是考察的主线。晋元帝与琅邪王导的合作开创了东晋朝廷。“王与马，共天下”的谣谚，其背景就是士族与皇权的分享政权。继琅邪王氏之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家族的头面人物，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先后与司马氏皇权分享政权。门阀与皇权“共天下”，是东晋最基本的政治特征。

按，传统的士族研究中曾流行“婚宦”模式，由婚姻制度或选官制度切入。前一个是社会史的，探讨封闭的通婚圈如何维系了士族高贵身份；后一个是制度史的，探讨选官特权怎样保证了士族对高级官职的独占。《东晋门阀政治》则在通婚、仕宦之外，从动态的政治斗争中，揭示了门阀是如何凭藉其政治军事实力，具体说是对主力军队和军事重镇的控制，而得以与皇权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皇权的。军政实权是“门阀政治”的基本条件，“士族专兵”是东晋政治的重头戏。故军权与要藩的历次争夺，得到了浓墨重彩的阐述。

田先生又用了很大篇幅考察流民武装。仅凭文化士族不足以支撑政权。北方士民在南迁中形成了流民武装，江左朝廷加以吸纳，让他们承担江北防务，用作抵御少数民族的军事屏障。如京口重镇的北府兵和襄阳重镇之兵，皆是。田先生指出，东晋一朝政争，往往跟流民武装、流民帅相关。东晋政治的基本特点，被概括为“皇帝垂拱，门阀当权，流民出力”，流民武装问题，由此就跟与门阀政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了。而且流民武装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终结者。由北府兵将领起家的次等士族刘裕，凭武力、军功攘夺皇位，不仅终结了司马氏统治，也终结了门阀政治。正如胡宝国的评述：“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胡宝国：《我读〈东晋门阀政治〉》）以往学界对北府兵的讨论，大多不出军事、战争本身；而田先生拓宽视野，视之为门阀政治的必要组成部分，后来又成了门阀政治的异化因素。这是一个重大创获。

面对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例如全书以“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始，通过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与琅邪王衍的结合，进及东晋初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导的结合，由此打通了两晋间皇权与门阀的合作过程。其笔法兼精微、恢弘之致，谋篇布局匠心独具。由“王与马，共天下”一语破题，这让人不禁联想到陈寅恪，由《梁书》“江陵素畏襄阳人”一语，而引申出了“上层士族”与“次等士族”的精彩讨论（见陈寅恪：《论东晋王导之功业》）。记得一位研究生曾感叹，陈寅恪、田余庆，都能从一句话发挥出一段大文章。二例有异曲同工之妙。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论东晋初年东海王冲之封，引《搜神记》“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将分之象”之讖，其评述是“颇疑时人观察形势……托物妖以为警诫”。这个分析入情入理。又论晋末高雅之，又利用《搜神后记》故事为旁证：“此则故事虽似小说家言，但是去其伪而存其真，颇可以补史籍之不足。”不禁又联想到唐长孺了，唐先生曾用陆机（或陆云）路遇王弼之鬼的“鬼话”，以证“二陆在入洛之前……为了适应京洛谈玄之风可能加以学习”（见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宛如名医手下，牛溲马渤皆可入药。

《东晋门阀政治》采用的是经典的政治史方法，即围绕人物、集团、事件等等而切入展开。这样的方法，在传统史学中已有丰富积累。然而在人文领域中，传统方法并不因现代化而丧失价值，正如使用毛笔的传统书画艺术，不会因电脑的普及而丧失价值一样。而且田先生的论述中又灌注了现代史学意识。此书不同于家族研究，其中贯穿了一条鲜明的主线：其与皇权的关系。记得我写察举制的毕业论文时，打算写皇权兴衰与察举盛衰的关系，田先生

表示赞成，说“就是要抓住‘皇权’这个核心问题”。家族、集团的具体考察，由此升华为一个结构性、体制性的问题。既就政治学而言，政治集团的结构也是政体要素之一。在孟德斯鸠的政体理论中，判断“专制”与否，其标准有二：第一是政治制度的结构，例如是否存在三权分立；第二就是政治集团的结构，如果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如贵族、教会等，君主就难以专制。士族门阀，便是一种销蚀皇权的势力，与皇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田先生用“门阀政治”概念，特指“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在他看来，东晋的门阀政治，只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地回归于皇权政治”。在这样的阐述中，不但中古时期的皇权传统变得更鲜明、更浓重了，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变态-回归”的历史观照。这个“变态-回归”的史观，可以为魏晋南北朝史的解释拓展出新的空间。

上个世纪采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学者中，郭沫若等，把战国至清两千年，视为地主阶级所支配的“封建社会”，“魏晋封建”论者则认为秦汉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始于魏晋。但两者都把魏晋南北朝看作是“士族地主阶级”支配的时代。这种认识可以说是“经济史观”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则把中国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世三大阶段。“中世”即六朝，这是一个“贵族政治”的时代。贵族政治据称终结于唐宋之间，此时由“唐宋变革”而进入近世。这个“三段论”的分期，系比照西欧史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阶段而来。无论用“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史，以及用“三段论”解释中国史，都在相当程度上借鉴、比照了西欧的历史经历。

除此之外，在上世纪初，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在其名作《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把秦以下两千年都断定为专制集权时代。那么如何看待六朝呢？梁氏的看法，首先是“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然而“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体之进化，毫无损也”。这个看法，既不同于“经济史观”，尤其不同于“六朝贵族论”。梁启超的“专制政治论”，运用了现代政体理论，又立足于本土史书史料，而非以西欧史剪裁中国史。田先生的视线聚焦于政治体制，把门阀政治看成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与梁氏的看法，一百年间遥相辉映，又大大前进了一步。

近年学者对“唐宋变革论”有不少讨论，但六朝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如果六朝不能认定为“贵族政治”，那么唐宋间的政治变迁幅度，就没有“唐宋变革论”所夸张得那么大，并没有大到体制根本性转型的程度、“唐宋变革论”的一个主要论点，即唐宋间君主独裁取代了贵族政治，这个比照欧洲近代史而来的论点，就大可怀疑了。

对国外的各种“六朝贵族制”论者，《东晋门阀政治》只说了一句他们“一般不太重视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这一历史背景”，虽申明异议，但不做详论。2013年初，田先生在接受访谈时，被正面问以这样的问题：

最近一些魏晋史学者在一些场合谈到，日本的中国六朝史研究的核心思想是贵族制理论，而中国学术界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总结两个层面所作出的唯一回应，迄今为止只有《东晋门阀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晋门阀政治》是中国魏晋史学界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日本学术传统的一次对话。可是，仅仅从字面上看，《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并没有提到贵族制问题，也没有摆出理论探讨的姿态，因此史学界对此书与日本学术传统对话的性质似乎理解不足。请问这一描述是否准确？您强调门阀政治是汉唐皇权政治之间的一个变态，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本质上并不是对皇权政治的否定，显然是为了回应贵族制社会的学说。您对东晋政治的分析，是不是基于这种对汉唐社会与政治的连续性的理解呢？如果魏晋以降的社会与政治并没有真正偏离皇权政治传统，那么，是不是说，汉晋之际的变局，尚不足以使中国社会走向一个新方向？甚至可以说，皇权政治与制度仍然富有生机？

田先生的回答是：

我觉得迄今所知国外学者关于贵族政治的论说，……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

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千百年相沿的专制皇权思想和制度可能更换表现形式，却会在不同的外壳下继续存在，或者是继续被利用。把皇权这个因素过度淡化，看重几家门阀、几个人物在舞台上的活动，而抹煞其与皇权的互动，抹煞其假皇权以行事的实际，这样就出现了中西无别的所谓贵族政治。……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钟鑫整理：《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数千年中国史进程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无与伦比的。甚至帝制终结之后，皇权思想和集权体制依然长期保存在社会的骨髓里面。近代之初的历史剧变，一度催生了纷繁多样的未来愿景；而二十一世纪以来集权体制的历史走向，却令人们产生了新的观感，比如：“我们最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曾经有过的，最不可能拥有的就是历史和文化中没有过的。”（李银河：《中国政治改革的前提、目标和可能性》）中国会变、而且在变，但它有自己的历史逻辑，源于自己的“历史的遗传基因”。“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那么在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之外，“制度史观”再度显示了对于中国史的重大认知价值。进而为“变态-回归”模式，进而为认识其历史连续性，提供了一种基本思想方法：中国政治体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直线发展的，它经常上下波动、左右摇摆，出现各种“变态”，甚至升级转型。然而那些波动与摇摆，又不断地趋向于一条“中轴线”，包括专制皇权、中央集权、官僚政治、儒家意识形态等等。不妨说这条“中轴线”就是“常态”。

面对魏晋南北朝这个特殊时代，人们往往聚焦于它的特殊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等等。汉唐间的连续性，有时就被忽略了。“变态-回归”的解释模式，则将这样提出问题：

- 一、“变态”原因是什么？
- 二、“变态”的幅度有多大？
- 三、“回归”的动力是什么？

在此书的《后论》中，田先生做出了推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前此的孙吴不是，后此的南朝也不是；至于北方，并没有出现过门阀政治。而东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条件，是由于“一个成熟的有力量有影响的社会阶层即士族的存在”，“一个丧失了权威但尚余一定号召力的皇统的存在”，以及“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外部原因。这三个条件中任意一个的变化，都会导致江左门阀政治的相应变化。

对第一个条件，即汉晋间士族已发展为一个有力量有影响的存在，本书的《后论》部分提供了多方面的评述。在概述中，有一节对“由儒入玄”现象的阐述，颇可注意：几家大门阀在崛起过程中，其家族学术，都曾经历了由儒学转向玄学的历程。“两晋时期，儒学家族如果不入玄风，就产生不了为世所知的名士，从而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尊显的士族地位。”这个论断是发人深思的：一个阶层的兴起，竟然与一种新兴哲学思潮“玄学”息息相关。

而门阀政治的终结者是军人阶层，是北府兵，是流民帅与流民武装。那么我们来看，门阀形成中发生过“由儒入玄”，门阀衰落则来自军人的推动，“文”、“武”因素相映成趣，发人深思。罗素曾指出：“战争对于王权的加强一定起过很大的作用，因为战争显然需要统一的指挥。”梁启超论中国专制进化史：“专制权稍薄弱，则有分裂，有分裂则有力征，有力征则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则专制权高一度，愈积愈进。”李开元也曾指出，中国王朝的来源是“马上天下”，政治权力和政权机构起源于战争和军事。王朝衰败，以崩溃、战乱告终；此后则通过军人群体、军事活动与军事编制恢复了秩序，迎来了一个更强悍的皇权。然而在此之后，又将逐渐地回归于文官政治、回归于“士大夫政治”。这是否可以视为一个周期性现象呢。

第二个条件,即一度低落但依然存在的皇统——还应加上秦汉所留下来的集权行政体制的因素——预示着未来皇权的复兴可能。进入南朝,皇权复兴的可能性现实化了,门阀政治终结。

第三个条件,即“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意味着门阀政治的出现,外因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的理解是:在魏晋南北朝时,假若没有外部少数民族的冲击,华夏政权按照其自身逻辑前行,则秦汉集权体制的那些基本特征,将在更大程度上维持下来。换言之,假设不存在外部民族矛盾,门阀政治就不是必然现象。

而且“民族矛盾”的历史影响也是因时而异的。在全书收束之处,田先生又提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个论断,不妨称之为“北朝主流论”。虽仅一语而已,但仍来自数十年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的治史体察。异族的外部冲击促成了东晋门阀政治,但历史又是在北朝走向隋唐的。由此给后学留下了又一个问题:为何北朝成为南北朝的政治主流,成为通向隋唐帝国的历史出口呢?在南朝是北府军人、“次等士族”终结了门阀政治,北朝则是鲜卑军功贵族构成政权主体,他们振作皇权的动量,比南朝的次等士族更大。进而,历次北方少数族入主强化了集权专制这个重大问题,也就可以纳入视野了。

总的说来,《东晋门阀政治》包含着若干结构性、系统化的历史思考,由之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优点并不仅仅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娴熟运用。这是我个人的阅读心得。田先生通过各集团与皇权的关系变迁,细腻勾画出了一条“变态-回归”的轨迹。在田先生的启发之下,我尝试在政治制度的变迁方面,继续证成这种“变态-回归”。除了我个人的一得之见,读者还可以在专业书评中,看到对《东晋门阀政治》更全面的评述。如:“它是田先生多方面造诣的结晶,标志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达到的新的深度和高度”(陈苏镇:《东晋门阀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4期);“标志着国内对门阀政治的研究朝着系统化、理论化的方向迈进”(《〈东晋门阀政治〉介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本书超越以往以婚宦论士族的方式,从动态发展的角度,以细密的考证、精辟的见解为士族研究另开新局,是近年士族研究中难得一见的好书”,是理论创造和细致考订“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台湾学者刘增贵有《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予以好评(《新史学》第1卷第2期,1990年6月,台北)。日本的学术期刊《东方》,以《划时期的东晋政治史研究》(1992年10月,第139号。作者川合安)为题,对此书作了介绍。

《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初版)一书,汇集了田先生在1979年至1989年间的另外一批论文,共十九篇。这些论文涉及了秦汉魏晋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个人的新见解。《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一文,由秦汉之际的楚地反秦事件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通过了秦政权、陈胜政权与汉政权之间关系,展示此期的政治发展的宏观趋势。《论轮台诏》一文,考证汉武帝由帝国扩张政策向“守文”政策的转变,对以卫太子为首的“守文”势力与另一派用法兴功势力的矛盾,是其中心线索,尤有新意。《秦汉魏晋南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历程》一文,得出了如下推论:“在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出现的阶段,专制政权的干预所导致的依附关系发展的迟缓,也是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的诸多原因之一。”这是一个涉及了古代社会性质以及历史分期的论断,其中对专制政治与经济依附关系的分析,可与“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之论点相呼应。《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曹袁斗争与世家大族》等文,揭示了曹氏政权的草创期,与世家大族、黄巾余部、地方豪强等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隆中对〉的再认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蜀史四题》等考察蜀国政治史。对千古闻名的《隆中对》的战略思想的根据、来源和可行性重新评析,指出诸葛亮“跨有荆、益”的战略缺乏可行性。通过对大臣李严的兴废,展示了诸葛亮用人政策之实质,即如何处理刘备荆楚势力、刘璋势力和本土势力几个集团的关系。

这个着眼点，显然高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的泛泛之论。以往孙吴史的研究者，大抵把这个政权视为孙氏集团与江东大族的结合产物。而此书所收的《孙吴建国的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兼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等文，则揭示了孙氏的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还曾有过尖锐对立、相互敌视的阶段，两个势力的最终合作，乃形势所迫，并非自初如此。

把视线转向北朝，转向拓跋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并陆续发表论文，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相关论文，汇总为《拓跋史探》一书（三联书店，2003年初版）。这时候田余庆已值耄耋，竟能完成一部考索之作，殊属难能。北魏史的研究，汉化、改制、均田、士族、六镇起义等向为热点，研究者众多。但拓跋史的研究，尤其是拓跋族由部落向国家政权发展的早期历程，则因资料奇缺，相关研究相对薄弱。就是在这个资料奇缺之处，田先生又有新论。

田先生从一个具体细节，也就是“子贵母死”制度开始，由此牵引出了一系列论题，如“离散部落”等问题。它们都围绕这一主题：拓跋集团由草原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专制国家过渡时，拓跋族面对着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那些问题，进而发掘草原部落向国家转化时的规律性现象。

对北魏“子贵母死”制度——或称“立子杀母”，以往讨论不算太少，但并不是都注意到了这样一点：拓跋早期史上存在着若干强势的母后。道武帝的母后出自贺兰部，道武帝之后出自独孤部。拓跋族与其姻族组成了部落联盟，来自贺兰部、独孤部的母后与妻后，可以支持其领袖地位；而要建立集权体制，向专制君主发展，就要剥夺母后、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特别是干预君位继承的权势。道武帝赐独孤部刘贵人死，目的是抑制“外家为乱”。这就是“子贵母死”之制的实质和渊源。这是从部落联盟到国家的特定阶段的特殊问题。

在北魏国家形成过程中，道武帝还有过“离散部落”之举。学界的一个通行思路，就是从“分土定居”来认识“离散部落”，认为其目的是打破氏族纽带，把其部众纳入行政编制，制造编民齐民。本书则指出，“离散部落”与“子贵母死”二者背景相同，因为除了窟咄之外，离散对象几乎都是拓跋族的外家部族，如道武帝的妻族独孤刘氏诸部，母族贺兰贺氏诸部，祖母族慕容诸部。“子贵母死”是为避免后族干政的论断，就因“离散部落”的考察而强化了。田先生还把更多现象，例如乌桓族的“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则无相仇报故也”的风俗，史官记述早期拓跋史迹时的直笔与曲笔纠葛，北魏中后期的母后专权等问题等，跟“子贵母死”联系起来。

《东晋门阀政治》的政治史方法，即考察集团、事件、人物的方法，被继续用于北朝民族史上来了。也如对东晋门阀家族的研究，最终归结到“门阀政治”上来，《拓跋史探》的民族政治史研究，也指向了某些结构性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在草原部落向国家进化的历程中，一族与其他部族的姻戚、结盟、共生等关系，对国家形成过程的各种影响。甚至在国家、王权诞生后，这种影响还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一向是先秦史的热点之一。近几十年有先秦研究者提出，中国学者一度以阶级斗争解释国家起源，然而夏商周的国家形成过程中，看不到激烈的阶级斗争，反而是各部族间的联盟、对抗与征服分外活跃。面对中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个空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的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想。

由一个“子贵母死”的历史细节而顺藤摸瓜，这种治学之法和写作笔法给人的观感，也如《东晋门阀政治》给人的观感一样，即由“王与马，共天下”一句谣谚而牵出一系列重大问题。“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由小见大，由微知著，这是田先生的典型风格。他经常以“读书得间”教导我们学生，即读书治学，首先要在字里行间细细玩味，发现微妙线索，然后努力将之深化、拓展、升华；而不是预定纲目，照章填充。故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很多重要论断，都篇幅不长，甚至寥寥数语；引证史料亦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其

枝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

《拓跋史探》的相关书评认为，“作者从他独特的思考角度出发，终于把本来属于皇室内部的子贵母死制度与看似毫不相干的离散部落问题结合了起来。两个问题的结合真可谓互相发明，相得益彰。”（胡宝国：《在题无剩义之处追索——读〈拓跋史探〉》，《读书》2004年第6期）；《拓跋史探》“通过细密的思考捕捉到看似孤立的历史现象间的密切联系，发掘出影响拓跋百年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为深入认识北魏早期历史，乃至整个北魏史开辟了新的途径”（侯旭东：《田余庆著〈拓跋史探〉评介》，《中国学术》2005年第1辑）；是一部“提出了许多问题的著述”，展示了洞察力和举重若轻化繁为简的提炼能力（楼劲：《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

田先生的学生罗新教授还评论说，由于是老年写作，《拓跋史探》在选题、分析和文字上未能超越《东晋门阀政治》，然而也凝聚着深刻的时代体验和历史反思。而且“与《东晋门阀政治》的乐观昂扬不同，《拓跋史探》浸透了对未来的疑虑和对往昔岁月的感伤。前者表达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人的热情与希望，后者则源于乐观情绪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罗新：《推荐〈拓跋史探〉》，《南方周末》2008年7月6日）。虽然田先生的绝大多数文字都是客观的学术研讨，但作为国人而论国史，有时也会以寥寥数语，如罗新教授所云，流露出历史反思时的时代感受。

在《东晋门阀政治》的结尾之处，看到的是这样的论述：

不论在北方或在南方出现的这些事情，都不过是历史的表面现象。历史运动中的胜利者，不是这一胡族或那一胡族，也不是江左的门阀士族或次等士族。历史运动过程完结，它们也统统从历史上消失了。留下来的真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是江南的土地开发和文化创造，是北方的民族进步和民族融合。这些才是人民的业绩和历史的核​​心。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学人庆幸度过了时代曲折，对未来抱有热望。田先生的上述论述，也展现了对“历史终将克服曲折”的乐观信心。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拓跋史诸文，则不相同了。对拓跋史上那些违背天伦人性的逼母杀妻、“子贵母死”做法，田先生多次使用“残酷”、“野蛮”之辞，并怀着“文明孕育于野蛮”的苍凉之感，表达了这样的沉重祈望：

在野蛮孕育文明的人类进化过程中，当一个部族、一个社会群体走完了进化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高奏凯歌之时，它们在精神上还可能承受沉重的负担，隐藏着由于他们的残酷行为而留下的心灵痛楚。我们为拓跋的历史感到沉重，为乌桓的历史感到沉重，也为人类历史包括我们亲历的历史感到沉重，而祈求历史的进步。

数十年来风雨波荡，田先生的所感所思，有时就会以微妙的方式，体现在古史论述之中了。又如《论轮台诏》一文，评述汉王朝的政争几乎都伴以屠杀，汉武帝用屠杀为政策转变开辟道路；《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评述孙吴培植受益阶层以充实统治机构，其时选官鱼龙混杂，而主事者暨艳不识时务、不容忍腐败，故结局悲惨。像这样的细微之处，在长篇历史考索中虽然只是偶出数语，读来却有会心之感。附带说，田先生跟学生们的日常闲谈中，也常涉及时政，在对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追求上，师生的信念是共同的。

我在读硕士研究生开始师从田先生。因时代原因，起点太低；又因性格原因，天马行空的空想太多。回想起来，专业上入门甚晚，只是在田先生的门下长期耳濡目染，才稍知门径。曾为《拓跋史探》一书的日译本写过一篇《田余庆先生的介绍》，今就中文原稿修改扩充，以成此文。为田先生的逝世拟了一首挽联，附记于此：

郁郁乎文，析汉晋拓跋，穷微阐奥，著文足以不朽；
岩岩其志，宁有恨无悔，播火传薪，遗志是当长遵。